

黔地与黔学论要

◆ 赵河清^①

摘要：本文从人地关系视角，阐释黔地无平原、无大河和无大湖的“三无”特征及交通枢纽地位，与黔地历史文化独特内涵和构成之间的因果关联性。提出黔学涉地范围超出贵州省域，并成为黔、湘、滇、川和桂共同研究课题的己见。探讨了明前黔史因史料疏缺、文献无证所造成的研撰困境，从编年史的角度，做了书写贵州明前信史的初步思考。简论了拓宽黔学研究视野，以及寓客文化、过境文化和构造（路桥）文化与黔地地理特征的关系。最后略及黔地山地战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黔地及地理特征 苗疆 多维视野 寓客文化 编年史 山地战

陆地不仅是人类生衍活动的基础载体，其地理环境还深刻地影响着居于其上族群的思想和文化。黔学论者，早已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注意到黔地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及其对于黔地历史文化的塑造和影响。本文主题，即黔人与黔山、黔学与黔地之关系。对因文字记载尤其是编年的缺失给明前黔史研撰所带来的困扰和问题，本文也略做探讨。

^① 赵河清：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化问题、浙江大学西迁史。



一、黔地与苗疆

黔学的空间范围无疑是现在的贵州省，以及处在这一范围内的历代相关政区。明之前，黔地政区变化多端，呈现在历史地图上，真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著黔史者常为之困扰。现代人撰写区域或政区历史，其空间一般以当前的区域或政区为准，以此去框限书写的范围界限。当过去政区与现在政区不重合且包含邻省区部分地界时，通常采用包括某政区某部分的分解性陈述，来保证历史空间的前后一致性。这是政区或区域史家通常遵循和采用的法则。但政区史或区域史著者如果仅从政区的置废省并、规制调整、改称易名等政治层面聚焦用力，其历史脉络和文化事象就会受到连带割裂与肢解，导致连贯性和完整性的断脱。

贵州建省之时，便有批评责难的声音，时至今日，坊间关于撤并黔省的说法仍有所闻。一行政区的撤销，是否意味着这一区域的文化戛然而止、瞬间消失了呢？以行政单元而论，确实是这样，但以地理单元而言，并非如此。因此，考察黔地历代政区沿革以把握其历史脉络，分析贵州地理空间以探寻同质共性的文化，在黔学一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互补性。

黔地历代政区，其数量时多时少，面积时大时小，但黔地的地质地理的结构特征却变化微小。先后入境的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源主要取之如海黔山，换言之，黔人世代生衍和传承文脉的载体或平台即黔地。黔地范围有多大？赋予黔地独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特质的主要山脉有哪些？以下以地理、历史、民族和文化等为依据，画出大致界线。

在贵州与四邻接合部环带内，画出称为黔地的范围，即一个有着共同地理特征和文化形态的区域，绕不开“苗疆”这一空间概念。狭义苗疆指湘西黔东和黔东南苗族聚居地区，广义苗疆则指贵州及与四邻省区接合部的苗族主要分布地带，称之为大苗疆。^①黔地亦有狭广之分，狭义即今贵州省，广义

^① 黔地民族数十，其中彝族和布依族历史悠久，人口较多，与苗族共享黔地山水，构成苗疆中的苗彝社会和苗布社会，其他民族和各期入黔的汉族，亦为苗疆大文化组成部分，本文限于篇幅，未展开论述。

则超出今贵州省，包括邻省区部分地域在内，可称为大黔地。以下“黔地”和“苗疆”如不做说明，即为大黔地和大苗疆。^①苗族与山岭相关相连难舍难分。苗族经过漫漫迁途之后选择了黔境山区生息繁衍，在数个少数民族共生的区域内，苗族对山峦叠翠之地仍然情有独钟。歌谣道：“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苗疆之外散居杂处于其他民族之中的苗族，亦多分布于山区，如云南楚雄、曲靖和玉溪等地山区，海南岛琼中等地五指山区，广西大瑶山区，四川大凉山区等。^②

苗族并非天性偏爱山岭，“窜三苗于三危”“杀三苗于三危”“有苗不服，禹将伐之”“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亟之”“三苗将亡”“杀一苗人赏银三两”“呈天朝之兵力歼绝其种类”“灭苗镇”等等记载^③，无不透露出苗族数度南迁，最终选择黔境山区为避难所、栖居地和大本营的原因。明清朝廷对苗族反抗的镇压屠杀，致使黔地苗人继续远迁。现今分布世界各国的苗族，大多自认根就在贵州。

“国家有万军之勇，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④此言出自越州（今曲靖）土官阿资之口。尽管黔山不能完全阻遏朝廷对苗族的剿杀，但苗族还是在黔山的庇护下，成为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实体延续至今的民族之一。汉民大规模移入之前，苗族已成为黔地分布最广、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民族，明清乃有苗疆之称。

黔地与苗疆，两相对应，苗岭、武陵、乌蒙和大娄山区的苗族历史共源，至今血脉相同、文脉相通。黔地苗族语言分为东部（武陵区）方言、中部（苗岭南山区）方言和西部方言（乌蒙大娄云岭区）三大方言区，其语言

① 以当今省区为题研撰历史者，跨省越界很难避免。尤其黔省，明代之前，或为不相统属地带，或分块隶属不同政区，由今回溯，不能顾此失彼，致缺失偏差。大黔地和大苗疆的提出，基于地理单元和历史脉络，但划出范围很难做到精确，此种划界为讨论性质的一家之言，目的在于开展对话，以探黔学旨趣。

②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③ 引语见《尚书·舜典》《孟子·万章》《韩非子·五蠹》《说苑·贵德》《墨子·非攻》《古本竹书纪年》《苗族通史》（第一卷）、《嘉靖贵州通志》。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313，列传201，云南土司一，曲靖。



相通率在40%以上。西部有操中部方言者，中西部有操东部方言者，另有操汉语、侗语、布依语等他族语言者。黔地苗族以黔地各山脉为相对固定的分布聚居区域，但本族之间及与他族也有相互迁移、穿插和交往。^⑤苗族当前的主要聚居区或分布地，即黔地或苗疆的大致范围。黔地语言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和交互作用，形成黔地语言多重交叉的互译、转义及较为复杂的叠加现象。黔地语言文化既具有多民族地区的一般性，也具有黔地的特殊性，这里附带提出，意在引起关注和探讨。

以人口约占国内苗族一半的贵州为基本盘或大本营，苗族三大聚居区分别为：苗岭山区（黔桂29县市）、武陵山区（黔渝湘鄂35县市）、乌蒙大娄山区（黔滇川46县市）。南山（湘桂边区）、云岭东南（滇桂边区）两山区，不仅地缘上与黔山相连，且列西南五大苗族聚居区，应视为苗疆或黔地延伸部分。^⑥

山地与平原的自然人文景观迥然有别，贵州的山地特征在与平畴地区的比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明代贵州建省和清代政区调置，并未将黔地有着共同语言文化的同一民族悉数划入黔省，而是切割开来，归属不同省区。但划界并未抹掉政区边界两侧曾经的一体过往，并未切断黔省与邻省区接合部苗

⑤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一卷），第45页。

⑥ 大苗疆苗族主要分布区以五省区县市名列出（贵州省县市名略）：1）苗岭山区（黔桂29县市）：黔东南14县市、黔南6县市、贵阳等4县市，广西南丹、环江、罗城、融水、融安5县。2）武陵山区（黔渝湘鄂35县市）：湖南花垣、凤凰、吉首、古丈、泸溪、保靖、永顺、龙山8县市，怀化麻阳、沅陵、新晃、芷江4县，张家界桑植、永定2县，常德石门1县；贵州铜仁5县市，黔东南2县，遵义1县；重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4县；湖北恩施、来凤、宣恩、咸丰、利川、鹤峰、建始、巴东8县。3）乌蒙大娄山区（黔滇川46县市）：贵州安顺3县市、毕节8县市、六盘水4县区、黔西南8县市、遵义8县；四川宜宾珙县、兴文、筠连3县，泸州古蔺、叙永、合江3县；云南昭通、彝良、威信、镇雄、永善、盐津、大关、巧家、会泽9县。4）南山山区（11县市）：湖南邵阳城步、绥宁、武冈、新宁4县，怀化靖州、会同、洪江3县市；广西桂林龙胜、资源、恭城3县，柳州三江1县。5）云岭东南山区（22县市）：云南文山、广南、马关、丘北、文山、砚山、麻栗坡、富宁、西畴8县市，红河屏边、金平、蒙自、河口、开远、元阳、个旧7县市；广西百色隆林、西林、田林、那坡、田阳、靖西、乐业7县。资料来源：A.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一卷），第41—43页。B.王春林等：《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构成与发展》，《人口研究》1983年第3期。

民和彝民等的血缘关系，并未阻隔建立在共同社会形态和文化风俗之上的交往互动。划出大黔地范围的最主要根据来自历史，尤其是黔省与四邻接合部苗族和彝族等一脉相承、水乳交融的历史文化，以下略加例说。

作为苗族公众议事和“立法”活动的“埋岩”，在黔桂接合部的苗族中原先是共同举行的。随着人口增加，为便于管理，设置分岩，如广西融水县杆洞乡的“整巴埋岩”原隶属贵州省从江县的“鸠东埋岩”，后从“鸠东埋岩”中分岩到杆洞。融水的“松奴埋岩”也是从黔古州（今榕江）“整高汪欧埋岩”中分出来的。^①如今，居住于黔桂接合部的苗族，常跨省区参加本族文化活动。类似“此次前来参加黔东南从江县加勉乡党港村苗族鼓藏节的家族，来自荔波县佳荣镇坤地村、榕江县计划乡摆朗村、广西环江县驯乐长北村等”的消息报道，并非一时一地之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实属常见，屡屡发生。

黔滇接合部的黔西彝族乌撒部与滇东彝族各部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实为一体。云南沾益土司的前身为磨弥部，与乌撒部同源自二十三代前共同祖先。彝族六组分支第四支的第十七代卧侯德额的九个儿子，又在乌撒草海边举行分支仪式，其中一支德额罗形成乌蒙部。乌撒占领了阿底等部后与乌蒙部接壤，并长期保持姻亲关系。元代曾建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乌蒙之间虽时有争斗摩擦，但遇外敌则一致对抗之。乌撒与芒部同根同源，并保持着姻亲关系。明嘉靖五年（1526年），朝廷试图在芒部改土归流，削弱该地土司力量，据《明史》载：“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故与芒部为唇齿。自芒部改流，诸部内怀不安，以是反者数起。”^②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不得不恢复了芒部土司。

湘西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是苗疆最大的苗族聚居区，历代王朝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辖，甚至明清的改土归流，也未能彻底改变这

① 徐晓光：《无文字状态下的一种“立法”活动——黔桂边界苗族地区作为“先例”的埋岩》，《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 吴旋涛：《乌撒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7年，第45—47页。引文见张廷玉等：《明史》卷313，列传201，云南土司一，曲靖。



里苗族的自立自主状态。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从黔东铜仁亭子关到湘西保靖喜鹊营筑建长约380里的边墙，称“苗疆千里长城”，东为汉地，西属苗境，遵汉不入境、苗不出峒之规，为不相统属之地。^①武陵苗岭及其间的沅江上游、清水江流域所对应的地域，在清代文献中被直呼为苗疆，确切地说，黔东（南）湘西地区乃大苗疆的核心地域，清雍正到同治间以苗族为主的历次大起义即为明证。而盘瓠、三苗、楚蛮、武陵蛮、五溪蛮的内涵及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是需继续索解的重要问题。

咸同苗民起义被镇压不久，清廷于全国实行“自强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达谕令，要求各省拟订计划批复后实施。黔、湘、桂、川等省区凡苗民聚居之地，纷纷要求开禁，拟订开禁事宜，以解除撤销长期强加在苗族身上的交往、贸易、婚姻、证照、教育等禁令和桎梏。至此时，贵州全省的“改土归流”基本完成。^②

二、“三无”荒要与西南枢纽

将“贵州是没有平原支撑的唯一省份”换一说法，即占全省面积约4.52%的平坦地面，星散分落于1.4万个左右面积不等的坝子（最大面积79.47km²，119205亩；最小面积0.0063km²，9.45亩）之中。研究者将贵州坝子分为6个等级，其中小坝子（等级5，平均面积0.24km²，360亩）9398个，占坝子总面积的28.61%。大坝子（等级1，平均面积15.05km²，22575亩）124个，仅占坝子总面积的23.31%。^③贵州除无平原（包括四川盆地、广西盆地那样的大盆地）外，亦无大河和大湖，可称“三无之省”。长江和珠江为中国南部大河，黔地诸河皆为两江支流。贵州最大淡水湖草海一般水深2m，最大面积达45km²（为洞庭湖的1/60、滇池的1/6不到），蓄水量1.4亿m³（为抚仙

①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二卷），第350—351页。

②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三卷），第6—7页。

③ 盛佳利：《贵州省坝子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坝子—山地耦合类型》，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18年，第19—20页。

湖的1/128)。草海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积水干涸再积水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曾一度排水还耕。

苏州府“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吴郡常书上上”^①。黔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②。明清人眼中的大湖平原与“三无”黔地,反差何其之大。

审视历代王朝中国南部经略重心,无不聚焦川、滇、粤、湘等地的沿河、沿湖、沿海平原区。秦一统后,随着领土的延伸,五服说已非初创含义,王朝疆域南扩所到之处,有平原即为中原,有大河大湖则为鱼米之乡。黔地的荒要之名,不仅来自距离的考量,更是根据王朝税收和财政的算计。

“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惟尔贵州,远在要服”^③,因此,以贵州“三无”立论,并非无意义的缀余之词。

考察王朝政治史,黔地上演的,与滇、川(渝)、湘、桂、粤有着完全不同的剧情。

公元221年,曾经寄人篱下的刘备在成都称帝,这源于诸葛亮隆中策论。最打动刘备的,无疑是诸葛亮“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说辞。无天府沃土,无蜀汉政权,亦无刘备入蜀前后四川兴起的数个地方政权。播州杨应龙临亡前,唯一后悔的是没有西进据蓉控蜀。

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④先秦与三国时期的湖南,为楚国和吴国要域。汉初,刘邦封吴芮王湖南,后“屈贾谊于长沙”,为太傅。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刘发为长沙王(爵)。公元289年,晋武帝六子司马义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56页。

② 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0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 前引见郭子章:《黔记》(上),赵平略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9页。后引见明(嘉靖)《贵州通志点校本》,张祥光、林建曾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4页。

④ 陈寿:《三国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70页。



被封为长沙王。五代十国，马殷据湘称王，史称马楚，疆域西达黔中部地，历六主，存45年。

秦亡汉兴，南粤赵佗乘中央无暇南顾之机，称南越王，立国近百年。据载，南越疆域“东西万余里”^①。公元917年，刘龚据粤称帝立国，史称南汉，建都番禺，历四帝，享国55年。

贵州云南，山水相依，地脉一体，但建政于滇的南诏、大理，与唐、宋分庭抗礼数百年。两政权的兴起无疑有距中央辽远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滇西洱海地区自成单元平阔温润之土，及其上资源与人口对蒙舍和段氏称雄西南抗衡朝廷的支撑。

考察位于上述四邻之中的贵州，于中央王朝走向衰朽中枢失效的改朝换代之际，从未建立过作为建新王朝候选力量的独立政权。既从无本土势力竖旗建政，也从无外来势力入黔另立山头。除“国”政性质至今不明的夜郎外，黔地无论是大姓势力，还是土司政权，皆从本土族群中自然生长形成，并且一般得到中央册封认可，一旦“叛逆”，朝廷即派兵剿平，郡县其地。苗疆苗族虽曾有过建政立国意图，但终无结果。苗族大规模的反抗起义目的是自救图存，与群雄割据逐鹿中原一统华夏的政治意图全然不同。黔地早期君长，中期蛮酋，晚期土官，新王朝建立，往往以降服归顺自安。这也是历代王朝能够长期对黔地行羁縻策的前提之一。

秦汉时期，是黔道开发并纳入王朝交通网络的重要开端。“汉孰与我大”的记载，说明汉使到达之前，滇黔长期与中原无人员和信息交往。五尺道、夜郎道的开辟，第一批汉人移居黔地，这为黔西黔中汉墓所证。早在战国，楚国庄蹻就从东而西，横贯黔境，入滇称王。以现贵州省域而论，元代之前，黔西与滇、黔北与川（渝）、黔东与湘、黔南与桂的四向道路，以及境内成百上千的山间羊肠小道，在过境行者和各族居民的开拓下，已形成网络。然而，黔山辟路艰难，中央王朝不愿对鸡肋瘠地筑路给予大投入，贵州因南诏大理割据沦为边地，各业汉人视黔地为畏途不愿入黔，苗族等黔地世

^① 司马迁：《史记》（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9页。

居民族因需利用黔山作为阻隔和保护屏障开山筑路意识不强等原因，使黔境不仅多为崎岖窄路，且功能囿于地方性。时势发生变化，有的路段便废弃荒芜，因此，不少古路，只见书名，寻之无迹。

蒙古人入主中原，黔地交通格局为之改观。蒙古帝国并非名号，其扩张性实为空前。忽必烈不仅将云南纳入版图，还将其作为向东南亚和南亚扩张的前沿。东晋至南宋，王朝经济文化重心完成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庄蹻由楚入滇的一线路，弃用上千年后，升级为元帝国干道，并改由兴义入滇为由普安入滇，经曲靖到昆明。蒙古人本身乃来自寒远大漠的少数民族，前朝对黔地和民族的歧视现象在蒙古人的治理下有所改变。元朝大一统不仅使黔地复为内地，而且于黔中部地区设置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为其后在原来为边缘和蔽塞的黔地建省及黔中转变为西南交通枢纽创造了条件。成都管军万户刘德禄上言：“愿以兵五千人招降八番蛮夷，因以进取交趾。”^①说明此时由黔地南下两广已军行无阻。

朱元璋逐元建明，随之粉碎蒙古残余割据云南企图。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于黔地设立卫所，驻军湘黔滇通道两侧。朱棣再设布政使司，在黔地建一级行政区。明政府在元道的基础上，以贵阳为中心，再开辟出筑滇、筑湘、筑渝等干道，黔地的西南交通枢纽、贵阳的四向道路交会中心地位，已不可动摇。

无黔北（播州），作为地理单元的黔地不完整。杨应龙兵败，播州划为遵义、平越两府，平越府划归永乐已建省的贵州，但遵义府仍属四川。清康熙、雍正时期，对黔地已丧失军事意义的卫所进行了行政化调改，遵义入黔时机成熟。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4县1州）划入贵州，加上从湘、桂、川析调划入的地块，今日贵州省域界线基本确定。这是一件对黔地历史文化演进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就在此前，贵州的枢要位置，已在顾祖禹从军事地理角度的分析中清晰呈现出来。顾氏的立论前提是交通，黔道以筑城为中心，朝各方辐射，军事的设防与进攻亦在边界之要津，如由偏桥（施

^① 宋濂：《元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秉)出湘境辰、沅,即可鹰击荆南,垂头襄阳,制天下之腰膂。贵阳府当四达之交,控百蛮之会。^①明天启年间,水西安邦彦围贵阳数月,目的是占据贵阳,实现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湘的战略意图。^②以贵阳为圆心,辐射所至,均为明清要地和重镇,在半径数百公里的圆周地带内,西北至成都,东北达长沙,西南到昆明,再到大理,南至南宁。将半径倍增,东北至南京和上海等,南下可出境达曼谷,北上西安和兰州等,西即到藏东地。不到半个世纪,今天的贵州因高速公路和高铁建设,航线开辟,桥梁飞架,已由地面道路中枢发展为三位一体、多层结构的立体交通枢纽。黔地道路今昔对比,犹如霄壤。这一巨变,不仅令中外刮目相看,同时也为黔地黔学研究展露出广阔的视野。

三、黔地与黔学

贵州有些夸大其词的“三无”旧说,可概为“贫瘠山地”。清韦谦恒曰:“黔居万山中,民苗错处,可畊(耕)之土什无二三,故远近号为瘠国。”^③黔地粮食产量,远低于平原地大湖区。^④民谚“苏湖熟,天下足”的“苏湖”指长江下游的苏州和湖州,“两湖熟,天下足”的“两湖”指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和洞庭湖。明代苏州府垦田数约占全国百分之一,而上缴粮税却占全国十分之一。^⑤黔地气候温润,降水丰沛,无霜期短,就此而言,属优良的粮食高产区。但黔地位置的优越性,被莽莽山岳施加的负面作用抵消大半,导致优质高产土地面积过于狭窄,喀斯特地区土层瘠薄,山间谷底的作物受光照时间短,等等。群山如墙垣,阻遏经济文化交流,障碍政治联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121,贵州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231、5246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249,列传137,李耘传。

③ 韦谦恒:《重建贵阳府学名宦乡贤祠记》,见王昶辑《湖海文传》,道光十七年经训堂藏版,第32—37卷,第108页。

④ 以2016年为例,粮食总产量排名:四川、湖南、云南、广西、贵州,贵州约为四川的三分之一。单位面积产量排名依次是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⑤ 周振鹤:《体国经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1页。

系，堵塞组织渠道，将其中的族人分隔，使之散居于星罗棋布的坝子和缓坡地带。在黔建政缺乏财力支持和人口支撑，^①黔文化进阶受阻于道道障碍、重重壁垒，地理因素是苗族社会长期停滞在前文字阶段的重要原因。

仅从南北纬度来看，黔地无疑是农业时代最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域，该地带分布着多处早期农耕文明区域。证据表明，包括黔地在内的西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位置气候非常适宜发展农业的黔地，并未绽放农耕文明之花，黔地历史演进中的这一悖论或背离，却孕育了黔地的独特历史和多维文化。从“黔北尹珍”到“东方剑桥”，从西南“夜郎最大”到全国“增速最快”，从“蚕丛鸟道”到“万桥飞架”，黔地历史轨迹划出的是一条非同寻常之路。王朝自大偏狭思维模式下的“鸡肋蛮荒”“苗逆苗贼”，在现代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视野中，被切换成全然不同的景观，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陈国钧写道：“苗族社会与内地社会情形迥异。”“苗族终年只是劳作，质直诚朴，绝少恶劣嗜好。鸦片传入以前，不吸鸦片的苗族身体素质好于汉族，有结实的体魄。”^②苗族社会“有族属、无君长，有贫富、无贵贱”。榔款是苗族立法和执法合一的组织，法条通过榔款（会议制度）民主制定和实施。款首不能世袭，没有特权，族众有权通过会议罢免不称职不公正的款首，另选新首。^③苗族平等民主制和稻作文化贯穿苗族历史。^④

细究黔地地理特征，除了前述“三无”，不临边、不临海对黔地文化发育作用亦不可忽视。黔北与巴蜀荆楚为邻，得风气之先，较早受汉儒文化熏染，黔南尹珍中原学归，即定居拓荒于黔北。南宋时黔北播州冉从周中进士

① 贵州与四邻比较，东汉时期贵州人口100万左右，四川683万，排第4位的广西也超出贵州30万左右。南宋贵州人口240万，四川达1565万，湖南686万，广西、云南都超出贵州100多万。改朝换代时期，大规模的战争会导致人口急剧减少，而处于战争发生地或战场之外的贵州，人口变化却不大。以元明交替之际为例，贵州人口300万左右，保持增长，四川则降到320万左右，几与贵州持平，湖南、广西、云南也只分别比贵州多50万左右。数据来源：《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0年，第1、4页。

③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二卷），第365—366页。

④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一卷），第49页。



(1238年),为黔地第一人,比建省后的第一位进士早200年,南宋进士8人全在黔北。而明正统四年(1439年)中进士的张谏亦属黔北接四川的赤水卫人。黔北沙滩黎氏先祖由蜀地入黔南,后由黔南返蜀地,黔北划入贵州省,黎氏家族再入黔籍。“在(黎氏)家族的文化血脉里,一直就流淌着汉文化的血液。”^①

黔山不等于贵州山,黔山延伸至四川盆地东缘、渝南缘和鄂西南缘,苗岭跨越黔桂,云贵高原本为一体。黔地南北西东出境之地皆无一望无际的平地,经过过渡地带之后,我们才会看到一马平川、一碧千里的大平原。秦汉之后元明之前的王朝,既无筑路开渠于黔地的筹划,治理亦鞭长莫及。汉武之后,平旷地域汉化儒化与疆域扩张同步完成,而黔地苗族却始终保持着自身文化,“旧时苗族椎牛祭祖,不许流露一句汉语,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听到汉话,就要重来”^②。这一看似有些极端的例子并非孤例。明前入黔的世族大姓,大多数代之后亦逃不脱“夷”化的命运,不论是黔中牂牁大姓,还是播州杨氏、水东宋氏。^③即使明清移居黔地的汉兵汉民,时间对于他们似乎也停滞了。近现代学者入黔,惊讶地发现这里竟隐藏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源。人类学家首先感兴趣的是无文字的资料,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他所研究的民族不能书写,而是因为他所主要关心的东西与人们通常想要记录在石头或纸张上的一切都不相同。^④解释王朝时代黔地文化与境外汉文化演化轨迹的背离反差,深层视线仍要落在黔境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特征上。

费孝通曾对其师的研究方法评论道:马林诺斯基实地调查、现场观察、感受体会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想,及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的研究方法,与依靠书本记载、他人书信和翻译资料来引申理论的研究方法,在科学上有质的

① 黎涿:《沙滩黎氏与地域文化》,《教育文化论坛》2014年第5期。

②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二卷),第356页。

③ 对于黔地著名历史人物的族源和来历存在不同意见,并各有所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秦汉以来,入黔的汉人被夷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④ 庞芳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读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长江丛刊》2017年第3期。

差异。而正是这个差异，把这门学科推进了一个时代。^①对黔地前文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无疑是黔学的半壁江山。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先后深入黔地苗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写出数量可观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著作。21世纪，黔地的现代化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对无文字少数民族“抢救式”的研究者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但黔学研究仍需面对书语文本文字档案，研究的成果最终也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现于世。真实的黔史是黔学或黔文化的支点和依据，由此，我们不得不面对黔学研究中只要涉史就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何获得明朝之前王朝正史无记载的黔史真相。

书语是继口语之后人类的高阶对话形式，其前提是文字符号的创制和使用。书写将人类的组织、活动和思想等保存下来，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丰富浩繁的文献和档案。在书语阶段，国家元首及主要以国家元首系之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和文教等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编年。春秋时期，各国史官以国君在位年份为时序，记录下君主言行和国家大事，产生了作为信史的中国最早编年史，如鲁国《春秋》、晋国《乘》和楚国《梼杌》。始于两汉，后王朝为前王朝编著正统史书成为惯例。正史以皇帝世系为纲，具有编年性质，再以皇室系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典章制度、地理政区、天文历法、徼外四夷等为目展开。编年史按时序罗列人事，作为读物，并非引人入胜。但历史叙事是建立在元史实或原史实基础之上的，而元史实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即编年史。这一论题所涉问题不少，须另做专论。

一国一族之编年，既可自编，也来自他编。黔地苗族，因无文字而无自书自存的文献档案和编年史册，这是西南大多数无文字民族的共有现象。正史中记载苗族的内容，与记载“四夷”一样，服务于“王土王臣”至高准则。正史中少数民族史料的缺漏和支离，造成今日研撰的困难。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民族简史为什么难写？就那么几条材料，各家都采用，所撰民族史内容既重复又一般化。这种没有民族特点的民族史，看了一本就不要看第二本了”^②。因缺材料，研撰牂牁、夜郎史，只

①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八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能从某些史籍的字里行间窥见点滴。至于政治制度和兴衰变革，更是语焉不详。为了写这一段政治史，也只能从片段记载中，述其梗概。^①此乃著早期黔史者无助无奈的感受。黔地上千年历史与文字记载稀缺的矛盾，给黔史著者带来的困难确实不小。

迄今为止，贵州地下发掘成果斐然，但仅凭古文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史问题。考古文物本身需要辨识，不能代替文字编年。由此导致建省之前的黔史中，断裂空白随见，疑点问题丛生。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夜郎著述连篇累牍，但关于政权性质、社会性质、存在时间、族别、疆域和中心等，既各持见解，又各有根据，谁也不能被证伪，因此问题不减反增。为什么改且兰为牂牁？牂牁改为且兰？夜郎是什么时候建国的？什么时候消灭的？存在了多久？夜郎与牂牁究竟是什么关系？^②因无文献记载可征，这些问题要么长期甚至永远存疑，要么根据自己的推论很快得出答案。不少黔史阅读者将罗甸国与罗施鬼国、夜郎国与夜郎郡县混淆不分，除粗心大意外，记叙相左、论据抵牾、时地紊乱、文献歧出、正误夹杂等也是原因，这造成对贵州史撰写的严重阻碍，王燕玉感叹：“若不一一疏通，贵州史即等于乱麻。”^③当前黔史旧问题未解，新问题又生，这里不再列举。

面对编年史的缺失，书史者不得不采用推理、推断、推论，加上合理想象，来构建系统连贯的黔史，可称为推论史和半推论史。何光渝指出：“王朝正史对黔地史实的疏载和不载，恰好给后世的补充和想象留下巨大的空间。”^④推论史必然导致对同一历史题目见解各异，结论相左甚至相反，如对鬼方坐落地域的观点、对播州杨氏族源的考证等等。需说明的是，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结论虽可商榷，但其质疑精神、研考思路，以及于黔地民族和名人的族源来历探索，仍具有启迪意义。

①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114—115页。

③ 王燕玉：《辨罗甸国与罗氏鬼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④ 何光渝：《如在天尽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李开元《秦迷》一书，对因无文献可考而导致的秦国历史空白，扮演侦探角色，寻蛛丝马迹，采用推论方法填补，解释了围绕秦始皇的诸多问题或谜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探索。但问题是，推论合乎逻辑，但缺乏实证，仍属推论历史。同样的问题见之于湘西吉首大学五卷本的《苗族通史》，因缺少编年支撑，研撰者在构建连贯完整通史过程中，一些段落只能用推论维系，如第二卷中“夜郎是以苗族为主体的方国”“滇国苗王”等结论有文字和实体证据，唯独缺编年支撑。^①包括本文在内的黔学黔史探文，有意无意，就以推论连缀历史，甚至陷入以推论证明推论的无据循环论证的怪圈。这里须做一说明，该通史不仅是苗族也是黔地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黔学正为黔、湘、滇、川和桂相关研究者和机构关注，成为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会使“尽管力求以明、清省界为准，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四邻地区”这一囿于行政区写史出现的纠葛迎刃而解。^②

农业国家（政权）形成后，编年是其存在过的重要证据。黔地秦汉前后长期无编年，能否反证黔地牂牁、夜郎并非农业国家（政权），而是部族联盟或联合体呢？需要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形成农业国家和建立政权的地理、经济、文化和人口等等条件，黔地并不具备。毕竟，黔地乌撒、水西、水东、思田、播杨等民族“政权”，与王朝史上角逐皇位的地域政权是有区别的。黔地政权大多经过中央认可，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而改朝换代期间各方势力建立的政权，不论地盘大小、人数多少，均地位权力平等，谁最后建政称帝号令天下，由战争决定。要在缺文少载的状况下，拿出黔地编年历史，是新的课题。目前，只能依据散见于正史地理志、蛮夷列传等篇目中的材料，黔地流官迁客的奏疏辞章，儒生文士的方志纪传，大姓土司族谱，庶民百姓家谱，出土文物，碑石凿文，口述资料等等构建编年，以迈出书写黔地明代之前信史的第一步。而获取黔地编年的更有效途径，还需不断思考和探索。

① 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二卷），第68页。

② 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四、余论

不断的深拓研究显示，黔学是多层次、多维度或多向度的立体复式文化。不同维度空间的结构与差异，是物理学和数学思解的问题。而转换视野，更新方法，从地理、政区、民族、文化等不同维度探讨黔地文史现象，就有可能发现黔学不曾深究过的或有待研究探讨的层次和领域，以下举例略窥之。

“黔古荒服，入明而缙绅先生始游宦其地。”^①明代大规模移民之前，从汉使到蒙古官员，入黔者有记载的屈指可数。而明朝至今，汉移民及其后代已逾两千万。政治流放、官员轮换、地理探险、商贸贩运、军事行动、企校搬迁、社会调查、民族考察、人才引进、旅游避暑等，一批批暂住者和过境者在黔地留下厚薄不一的文化印迹，这样的文化可称为寓客文化、过境文化。作为“三无”之地和交通枢纽的黔地，与寓客文化和过境文化的因果关系，应是不言而喻的。

迄20世纪中叶，“三无”黔地因为贫瘠，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无文字民族，尤其停在刀耕火种阶段的民族，其社会发展水平与平原汉族相较，还处于低阶，非移民的入黔者大多不愿久居滞留，更不愿扎根传代，或不得已而暂住，或过境之后不复再入。但他们所思所书，已烙上黔地印记，不单身曾在黔境，更因黔地民族对异文化的包容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没有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断钳制，使客寓黔地的学人和研究者，创造力得以释放，创造出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们所书写的思想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学等篇章，已载入史册，相关著述层出不穷，此处不再列举。寓客文化和过境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乃黔地独特地理环境孕育生发出的独特历史文化现象，与移民文化共同构成黔学的重要篇章。

明人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实际上，黔地亦有千条水，只

^① 郭子章：《黔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 第1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7页。

不过黔地溪水河流为山所遮掩。进入农业时代的定居黔人便在溪流小河上铺架石桥和木桥。明清时期，高大坚固的石拱桥在黔各地出现，大多至今仍保持着原貌，著名的如葛境桥、公馆桥等。但20世纪80年代之前，行路难在贵州的县乡村寨，仍然是区别于外省区的独有现象。然而，40年来，路与桥的建设，在黔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最高（桥面与谷底的垂直距离）桥100名中，贵州占40%，前10名里贵州有4座。排第一位的是贵州瑞杭高速北盘江第一桥，高度565.4米，比第二位的云南丽江塔库金沙江特大桥还高出53.4米。该桥与鸭池河大桥同获被称为“桥梁诺贝尔奖”的古斯塔夫·林德撒尔金奖。

截至2018年，贵州架设公路桥梁2.1万座，单幅总长约2500公里。平原道路只需遇河搭桥，此外难见桥影，因此人类道路桥梁史上这一重大成就和景观，一半功劳要归于黔山。在山地建造平直的高速公路，就必须在山之间架桥，不论桥底是河流还是峡谷。贵州群山如海，桥梁相应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并创下数十个“世界第一”。贵州桥梁是黔地路桥文化或构造文化的重要类型，行走贵州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山底溪流铺设十来米的石板桥，河流上横卧着数十米的石拱桥，大河之上两山之间飞架数百米、上千米的悬索桥，它们象征着不同时段形成的不同阶次的社会文化类型。

王朝时代的大规模战争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和政治核心区、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随着贵州成为交通枢纽和发展加快，元明清时期，黔地不仅战争爆发频次提高，规模也在扩大，如蒙哥在冉氏兄弟杰作钓鱼城的败北，元大德水西宋隆济抗元起义，明万历播州之役，明天启安邦彦反明廷战争，清康熙、乾隆和咸同苗族大起义等。黔地世居民族与朝廷的战争，是构成中古冷兵器时代战争史的重要篇章，尤其是山地战的理论和实践，值得研究和总结，但明末播州之战，当今不少明史和通史却无篇目。

2015年，遵义汇川区海龙屯申遗成功。海龙屯被称为西南山地军事城堡，这并非旅游噱头和浪得虚名，屯上石砌防御工事和设施，从残存部分，依然可见其构造雄奇、坚固完美。播州之战前期，杨应龙率领的苗军胜多

败少，“盖自飞练之后，黔中锐卒，尽创于播，无复敢斗之志，则振起之难”^①，“彼（安邦彦）诱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断其邮书，阻饷道，遮援师，则彼不劳一卒，不费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②。杨应龙、安邦彦、张秀眉等人所进行的山地战战例，从军史和战史的角度，实为宝贵遗产，应该受到重视，编入战争史。

①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1辑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5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249，列传137，王三善传。

